

文稿

柳宗元十騷析論

陳美惠、吳麗娜*

壹、前言

一、研究主旨與背景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指出「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顧炎武謂「詩體代變」，即是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中開章所說：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時」、「勢」之交互滲透與激盪，韻文文學亦有其不得不然的演變形式。韻文文體發展至漢代，以「賦」的形式展現說理與敘事的風采，發展至唐代，「詩賦」一類的作品成為唐代文類光譜極為重要的一環。

王力《古代漢語》指出：「賦與詩、騷的分別，必須從內容與形式兩方面考察。賦比騷抒情的成分少，詠物說理的成分多，詩的成分少，散文的成分多¹。」說明了詩、賦與騷文的不同。騷的文體溯自戰國楚辭，其中又以屈原〈離騷〉為冠冕，故而將此類文體稱為「騷」。劉勰《文心雕龍》、蕭統《昭明文選》²二書在文體分類上，都將楚辭歸於騷類。所謂騷者，「憂也」。當年屈原遭妒放逐的經歷，深化了他的內在感受，浸淫在流離憂傷地氛圍中，屈原藉騷體抒志寫情，悲壯頓挫地騷文作品，承載著他深沈的憂國愛民情懷。

唐代柳宗元與屈原雖相隔千年，卻有著相似的人生際遇。柳宗元因永貞革新而遭貶謫瘴癘蠻荒之地，內心衝撞著士不遇的悲憤與激越之情，他「參之〈離騷〉以致其幽³」、「導揚諷諭⁴」的著述，每每表現了幽寂深邃、隱微含蓄的審美追求，最能體現騷體之味，鮮明地反映時代的悲憤、

* 陳美惠、吳麗娜，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¹ 見王力《古代漢語》下冊，頁1286-1287。

² 劉勰《文心雕龍》將「楚辭」的篇名稱為〈辨騷〉。蕭統《昭明文選》中立有「騷」類（分上、下），兩書在文體分類上皆將「楚辭」歸為騷類。

³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文也。」（《柳宗元集》卷三十四，頁873）。

⁴ 柳宗元〈楊評事文集後序〉：「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柳宗元集》卷二十一，頁578）。

憂鬱與痛苦。

柳宗元是唐代傑出的古文運動倡導者，於文學創作上亦有巨大貢獻。他的山水遊記、詩、賦、寓言、辭賦等備受稱譽，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古文運動與文學的創作上有許多突破與成就。他曾在〈送從兄僞罷選歸江淮詩序〉一文中自述：「昔吾祖士師，生于衰周，與道同波，為世儀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世稱之。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孟子贊之。」可知其祖德輝煌，素有儒者風範。柳宗元自幼聰慧，飽讀經史百子，年少時慨然有大志：「始僕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為者。」（〈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自詡修德以承古之大有為者，在文學理論與創作上亦極有貢獻。明代胡應麟說：「論詩文雅正，則少陵、昌黎；若倚馬千言，雄辭追古，則杜、韓恐不及太白、子厚也。」（《少室山房筆叢》卷七）韓愈在柳宗元死後更慨然嘆息：「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祭柳子厚文〉，韓愈之言除了為柳宗元的遭際發出不平之鳴外，更表露了對其才華的肯定。近人林紓《韓柳文研究法》一書中說：

柳州諸賦，摹楚聲，親騷體，為唐文巨擘。大非有唐諸人所及。

深深表達了對柳宗元的肯定，「大非有唐諸人所及」正說明了柳宗元在文學洪流的巨大建樹。

《柳宗元集》中收錄柳宗元的辭賦計有古賦九篇，〈天對〉一篇，問答三篇，騷體文十篇，〈弔婁弘文〉、〈弔屈原文〉、〈弔樂毅文〉三篇，共二十六篇。諸篇辭賦中，又以十篇具典律化（canonize）的「騷體文」作品另闢蹊徑，最為突出。《柳宗元集》第十八卷「騷」類中，收錄有〈乞巧文〉、〈罵尸蟲文〉、〈斬曲几文〉、〈宥蝮蛇文〉、〈憎王孫文〉、〈逐畢方文〉、〈辨伏神文〉、〈愬螭文〉、〈哀溺文〉、〈招海賈文〉十篇騷體作品（以下簡稱「十騷」）。柳宗元在十騷中以獨特的創作手法，為中唐的辭賦創作注入新血，其內涵在體物寫志、敘事圖貌之外，常是託物起興，具濃郁現實性與強烈諷刺性。那麼柳宗元究竟在什麼背景下創作出這些作品？他的創作心態、主體意識為何？這些作品與其內在生命又有什麼聯繫呢？此皆為本研究關注的重心。

二、研究內容與方法

有關柳宗元的研究，歷來已有不少相關論文發表，大多就其生平、思

想、古文、遊記、寓言、詩賦等作品進行研究，有些涉及範圍並廣至美學、心理學、哲學等。探討柳宗元騷文的研究，有梁淑媛〈柳宗元貶謫時期賦體雜文的悲憤主題及其自我治療意義〉、蔡玲婉〈柳宗元騷題文探析〉、唐嗣德〈憤世嫉邪 爲民請命--柳宗元《罵尸蟲文並序》的承先與啓後〉、簡宗梧〈唐代賦體雜文研究〉等論文。梁淑媛〈柳宗元貶謫時期賦體雜文的悲憤主題及其自我治療意義〉以獨特的心理學視角，探討柳宗元創作賦體雜文之心靈情操的提昇，進而完成自我意義的治療。蔡玲婉〈柳宗元騷題文探析〉則從屈賦「楚辭體」的脈絡寫起，多著眼於柳宗元騷體文在屈賦的繼承，寫作筆法與騷體的文類意義。唐嗣德〈憤世嫉邪 爲民請命--柳宗元《罵尸蟲文並序》的承先與啓後〉一文僅就〈罵尸蟲文並序〉分析，耙梳其命題特色、文章旨趣，及其下開楊維禎《罵虱賦並序》的諷論文風。簡宗梧〈唐代賦體雜文研究〉以唐代有韻之文爲中心，此文多著眼於賦體雜文之用韻現象的量化分析，對於柳宗元騷體文的文本分析較不深入。本文即以上述諸學者的研究成果爲基礎，特以柳宗元十篇騷體文爲基本材料，就文本逐篇加以分析，論述的重心，將著力於柳宗元騷體文寫作的特殊面向之演化，與其內在之聯繫，如政治的、社會的、個人生命情境的具體環節，考察其彼此間的互相作用與旁衍變化以爲研究框架，通過從歷史的、環境的、文化的意義系統作爲觀照其作品的脈絡，解析文本的藝術特色，希冀對其十騷所融鑄的思想底蘊有一較爲全面的了解。

貳、政治際遇與人生體驗

一、中唐地政治社會

唐代自安史之亂後，兩都殘破，帝國分裂，斯時知識群體振起儒學以抨擊時政，亟思以傳統「士」階層所代表的「道統」以濟時溺，因此以韓愈、柳宗元爲中心的「古文運動」便由此開展，強調復興儒學，⁵吸收古文的優點以進行文體的改革。

⁵ 唐代古文運動以韓愈、柳宗元爲中心。「固窮守節」的韓愈在〈題歐陽生哀辭後〉說：「學古道而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此言標榜了韓愈以恢復古代儒家道統爲己任的文論主張。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也表達「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誇聲音」反對模擬，追求創新的主張。韓、柳皆力闢駢文，其文以載道，文以明道的主張，在創作上的堅持與努力不懈之精神，促使唐宋古文運動之開展。

考察唐代的政治與社會脈絡，唐代繼承了中國傳統的文官體系輔佐，科舉考試的制度，促使人才備出，加以唐代開設史館，魏徵、房玄齡等專修國史，促成了史學的進步，重史的學風滌蕩了士人的作史之志，成為部分士人「榮耀其身」與「高尚其志」的表徵，因此對史料的鉤稽，作史的實錄與褒貶精神的浸潤，構成了唐代散文風格的文化要素與書寫的藝術風格。

柳宗元為唐代古文運動的推手，他吸吮古典文學的養分，另一方面在中唐政經劇烈變動的社會需求中，尋求突破舊有的創作藩籬，因此他反對「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逾密以為能（（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的文風，主張「文以明道」⁶，標榜「思想」與「內容」為創作的核心，在其別創寓言式的史傳文字中，或用以抒懷，或用以論世，或批判現實而隱約其辭的諷刺雜文，都可以見到此一以貫之的脈絡。

二、生命的轉向----八司馬事件

唐代自安史之亂(西元 775~763 年)後，國勢由盛轉衰。不但內有宦官擅權掌政之憂，外有土蕃寇邊之擾，且因長期地藩鎮割據，造成中央與地方的分裂，社會阨隘，民生凋蔽。柳宗元於貞元九年(793)二十一歲時在長安城中進士，二十四歲（799）登博學宏辭科，又二年授集賢殿正字，自此正式踏入仕途。他本著踔厲風發的才幹，「以興堯舜之道，利安之元為務」⁷的抱負，與王叔文等深相契合，加入了能以天下為憂的賢者儲君李誦之下。李誦在永貞元年(805)正月二十六日即位，是為順宗，便任用即位前培植的黨人王叔文等進行革新，一方面壓制宦官氣燄，禁絕政風腐敗，一方面力圖改善民生凋蔽的現象。柳宗元無畏當時宦官、舊臣、權貴官僚們的壓迫，在政治舞臺上力倡永貞革新的精神。此一革新政策，無疑是對舊有的弊政投下了一鍼砭良方，但卻也無可避免得罪了一些元老舊臣，以及權大勢大的宦官們。於是宦官便籠絡當時為順宗所喜愛地長子李淳，又結

⁶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上。及長，乃知以者以明道。」又：「文者以明道，是故不苟為炳炳琅琅，務采色、夸聲音以為能也。」（《柳宗元集》卷三十四，頁 873）。

⁷ 見柳宗元《柳宗元集》〈寄許京兆孟容書〉卷三十，頁 779。柳宗元貶謫永州五年，與書京兆，書中言己早歲「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因「年少氣銳，不識幾微……果陷刑法」，此是內心沈痛的反思。繼而，文中又發出「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即文以求其志」之言以抒胸臆。

納與王叔文不合而有名望的元老，故由皇太子李淳即帝位，是為憲宗。憲宗登基後，王叔文黨先後遭貶，除朝廷先貶王伾為開州司馬，王叔文為渝州司戶外，稍後柳宗元貶為永州司馬、韋執誼為崖州司馬、韓泰為虔州司馬、韓曄為饒州司馬、劉禹錫為朗州司馬、陳諫台州司馬、凌準連州司、程弈彬州司馬，與柳宗元同貶者共八人，歷史上稱之為「八司馬」事件。八司馬事件像一記重擔般棒喝著「蹕厲風發」的柳宗元，使其深深體悟到沒有明君的支持，濟世之學將難以推衍，儒學民胞物與的理想終將難以實踐。

永貞元年（805），是柳宗元人生重大的轉捩點，23 歲的柳宗元開始了長達十四年的貶謫生活，「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開啓了他窮厄的貶謫人生，尤以王叔文遭賜死，王伾、凌準等革新的同僚貶謫後一一凋零謝世，愁腸百結地柳宗元面對現實惡劣環境的折磨與噬心悲憤的哀痛，不得不發出「我歌誠自慟，非徒為君悲⁸」的喟嘆！屈原〈離騷〉「感士不遇」的悲憤騷體，在此時機，終醞釀成為柳宗元宣洩不為世用情緒的出口。

三、窮厄淬煉，化悲憤為著述

永州地處廣東、湖南的交界，甚為荒僻，柳宗元遠謫永州後，政敵仍持續抨擊著他。懷著忠君愛國的理想進身仕途卻遭貶官的柳宗元，先是面對母親的病故，繼而王叔文遭朝廷處死，而後凌準也因嫉世憂憤病故，這一連串的打擊，令他不得不發出「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於大僇，徙播瘠土，醫巫藥膳之不具，以速天禍；非天降之酷，將不幸而有惡子以及是也。」（〈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的喟嘆，哀慟之言令人情惻！

此間，瘴癘侵襲不斷，加以無情的火災，令其神志與健康消耗為「行則膝顫、坐則髀痺」的程度，永州自然的山水風光雖稍可安頓他騷動不安的靈魂，可是漫長無期的等待，卻也無疑深化了他滿腹的落寞與悲憤。「水火之孽，群小之慍」，面對諸多不幸，柳宗元雖難以抑鬱內心的悲憤，卻也不輕易動搖忠君愛國的信念。他入世擔道的理想仍熾熱燃燒著，「雖萬

⁸ 見柳宗元《柳宗元集》〈哭連州凌員外司馬〉卷四十三，頁 1209。凌準於永貞元年十一月謫連州司馬員外司馬，柳宗元為文，發出「恬死百憂盡，苟生萬慮滋。顧余九逝魂，與子各何之？我歌誠自慟，非獨為君悲！」的喟嘆！

受擯棄，不更乎其內⁹」，不正是其堅持理想、不妥協惡濁環境的吶喊嗎？於是他一改仁厚的儒者風格與清新雋永筆鋒，繼承屈騷的筆法，以獨創的風格，令其理想、苦悶與悲憤之情自肺腑流洩而出，成為篇篇騷體佳作。五代劉昫說柳宗元：「既罹竄逐，涉履蠻瘴，崎嶇堙厄，蘊騷人之鬱悼，寫情敘事，動必以文，為騷文數十篇，覽之者為淒惻¹⁰。」《新唐書》本傳也說柳宗元：「既竄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郁，一寓諸文，仿《離騷》數十篇，讀者感悲惻¹¹。」兩者皆指出了柳宗元的辭賦之作，與其現實生活中的政治遭遇，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他將自己抑鬱悲憤的血淚與憤怨寄於騷體文中，他不僅模仿屈賦的形式，且深得其精髓，從其騷體文或罵、或憎、或斬、或哀、或弔等名稱為題，可知他創作時是帶有強烈諷刺、悲憤情緒的，以此抒發他的憤世與不滿。清儲欣《唐宋八大家類選》中說：

先生（柳宗元）騷文，命題便妙，曰罵、曰斬、曰宥、曰憎、曰逐，皆為賊賢害能之小人發也。然則宥愈乎？先生欲字持具身，無逢其害，故悲而育之。讀是文，覺與其受宥，無寧受罵受逐受憎，猶為愈乎爾。

正說明了柳宗元騷體文的深富諷諭。他以隱微曲折的手法進行諷刺之意，或正意反說，或借題發揮，都能使諷刺的騷體文達到具有絃外之音的曲折隱微之妙。他將原本以抒情為主的騷體，用以說理、諷諭與寫志，或借物諷刺，或借事諷刺，以散文作序、騷為正文的韻散結合創作形式，開啓了晚唐辭賦多元風格的創作形式。永州十年，柳宗元博覽群書，他在此般獨特的生活經歷和思想感受的基礎上，借鑒前人的藝術經驗，發揮自己的創作才華，創造出此種沉鬱中透出幽憤、冷峭、獨創的騷體文與獨特的藝術風格。

參、十騷的寫作筆法

清劉熙載《藝概》一書稱柳文「如奇峰異嶂，層見迭出，所以致之者，有四種筆法：突起、紆行、峭收、縵回也。」柳文章法的迂回曲折可見一般。其十篇諷刺強烈的騷體文之寫作筆法尤其鮮明，大抵分為以下兩類：

⁹ 見柳宗元《柳宗元集》〈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卷三十二，頁 841。

¹⁰ 見《舊唐書·柳宗元傳》卷一百六十，列傳一百十。

¹¹ 見《新唐書·柳宗元傳》卷一百六十八，列傳九十三。

一、借物諷刺

柳宗元主張「文以明道」，傳統知識份子其對文統與道統的堅持，成為他書寫騷文脈絡裡的價值核心。他在〈答韋中立書〉曾自述創作經驗：「本諸書以求其質……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詰，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由是可知他創作騷體文的內涵，不只是單純的敘事圖貌，而是藉此展現其志業的一種形式。抒發議論，卻也滌盪了他士不遇的悲憤之情。柳宗元十騷大多以詠物爲主，但是這些詠物賦並非單純地爲詠物而詠物，他往往利用所欲批判的現象與事物，連類而及，託物寓意，借物諷刺。如〈罵尸蟲文〉所寫傳說中的「尸蟲」是處人腹之中的陰穢小蟲，「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並「幸其人昏睡，出讒于帝以求」，因此，「人多謫過，疾癘、夭死」，柳宗元尤其憤恨此「陰穢小人」的所爲，特作文罵之，〈罵尸蟲文〉中說：

以曲為形，以邪為質，以仁為凶，以潛為吉。潛下謾上，恆其心術，妒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讒于帝，遽入自屈。

從柳宗元罵尸蟲等辭，可知他將現實政治生活中，讒言害正直之土地奸佞小人比作尸蟲，同時也把庇護尸蟲地「天帝」，影射好信讒言、忠奸不分的皇帝。此文由遠及近，因物喻意，容易使人產生聯想，從對尸蟲地大肆討伐而悟及對讒佞小人的無情鞭撻，諷刺效果不僅入骨三分，更是饒有餘意耐人尋味，方回因此在《瀛奎律髓》中以「峭而勁」讚美該文。柳宗元生活的時代，正是唐代日益衰頹之時，他親眼見證了皇帝的昏庸、宦官專權、藩鎮割據的種種現象，將此深刻的感受托物烘托，借物諷刺之旨特別鮮明。

又如〈斬曲几文〉描寫曲几的型態是「其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用絕繩墨。勾身骸狹，危足僻側。」彎曲傾斜，奇形怪狀几卻能討人喜愛，實際上則是以曲几諷諭當時以諂諛獲用地的政治小人，就如同那些迫害永貞革新之士而獲晉用的邪佞小人般，心術不正，體態歪斜。又如〈宥腹蛇文〉中「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陰妬潛狙」的邪惡毒蛇形象，不正影射了殘忍迫害他人之徒嗎？這些借物諷刺的騷體文，因善擇比喻之物，且能生動鮮明地刻畫出所要諷刺、批判的對象，常能一針見血的抨擊不合理的社會現象，極盡諷諭作用。

二、借事諷刺

柳宗元曾熱情地投入永貞革新，身處政治權力中心的體驗，使他建構了縱觀唐代社會弊病的恢弘視野。當改革失敗貶謫永州後，他得以有機會從社會底層深刻體察真實的世俗民情，此般宏觀與微觀社會的經驗，加深了他對迂腐貪官權貴的批判力，更也建構了他對政治弊端的覺察、伸張正義的堅持，由此形成對國家的憂患之感，怨怒之情，全寄託於其騷體文中。其中雖有部分作品以敘事為主，卻不是單純敘事，而是就所敘之事與所諷刺對象間之相似處，由小到大，連類而及，由事寄託，藉以諷刺說理。它和前一類騷體文的區別在於有著鮮明的故事性、情節性與敘事的張力，例如〈哀溺文〉便是以借事諷刺的手法見長，甚可作為一小小說觀賞。柳宗元在〈哀溺文〉小序中說：

永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湘水。中濟，船破，皆游。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為？」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怠。已齊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于是作哀溺。

該文以精練的語句，描寫出一善游的「永之氓」，因不肯丟棄纏於腰間的千錢而被溺死之狀。序文以「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于是作〈哀溺〉。」作結，語意精警，亦點明了寫作動機。「死者不足哀兮」之警語則深刻的批評迂腐、貪婪且無知的上位者。繼而他又在正文中進一步渲染描述著：

世濤鼓以風湧兮，浩漭蕩而無舟。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窺而詭求。

手足亂而無如今兮，負重踰乎崇丘。既浮頤而滅兮，不忍釋利而忍尤。

如此就把一個要錢不要命人物形象，烙印在讀者心中。柳宗元的用意絕不只是在敘述此一故事，他在文中點明道：「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顯然是以這個要錢不要命的故事，由小及大，由此喻彼，由普通的氓推及到「大氓」，尖銳的諷刺那些貪貨愛財，利令智昏的官僚，貪婪無饜，執迷不悟，必將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同時也對於人民的疾苦寄予同情。文中以「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為余再

更。噫！」作結，語重心長，發人深省。馬積高《賦史》評論說：「它是就一個普通人在渡水時因捨不得丟掉腰間的千錢而溺死的事件發感慨。但作者批判、諷刺的鋒芒卻仍然是指向上層社會的人們。」可知利令智昏的官僚是造成民生疾苦的元兇，也正是柳宗元強烈撻伐的對象。

又如〈辨伏神文〉一文中寫柳宗元為醫病買中藥茯苓，得到的卻是冒牌山芋之事，由此「推是類也以往」，對那種「以芋自售而病乎人」，以假亂真，欺騙蒙混的卑劣行為進行鞭笞，並告誡人們要提高警覺，因為「物固多偽兮，知者蓋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禍。」他在〈辨伏神文〉文末發出：「嗚呼！物故多偽兮，知者蓋寡。為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詞兮，願寤來者。」的感嘆，教化人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更希望在生活中易見之事，由個別到一般，以小喻大，產生對人的醒世作用，此類借事諷刺的騷體文常能在敘事中夾雜議論，透過渲染描寫，深寓諷諭。

肆、十騷的藝術特色

柳宗元十騷除了在內容方面有著強烈的諷刺外，也帶有獨創地藝術性，他十篇諷刺強烈的騷體文依其創作的特色，可分為以下五點：

一、饒富想像，窮形盡相

柳宗元少年時曾苦研辭賦，離騷中瑰麗的辭采、豐富的想像力與獨特的創作形式，醞釀、激盪出諸多精彩的辭賦作品。其十騷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饒富想像，窮形盡相¹²，創造生動鮮明的人物形象。

柳宗元在文學創作中原本就十分強調形象的描繪，他曾指出：

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
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
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¹³。

「善鑿萬類」、「鏘鳴金石」說明了其文學創作中「精於描寫」的主張。他在〈哀溺文〉中描寫善游之「氓」，因惜腰間所纏千錢而溺死時的情景，寫來真是神來之筆：

¹² 章行嚴稱：「子厚此類遊戲文字，大抵窮形盡態不只入木三分，自饑自訟，特一間耳，非自道其所經歷，不能親切如此。」（《柳文探微》〈乞巧文〉卷十八，騷，頁562）。柳宗元十騷作品，有其生命深刻的體驗，因此作品中窮形盡相的描寫，饒富想像，亦極富現實色彩。

¹³ 見柳宗元《柳宗元集》〈愚溪詩序〉卷二十四，頁643。

呼號者之莫救兮，愈搖首以沉流。髮披以舞瀾兮，魂俛俛而焉流？
龜鼃互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為羞。

寥寥數語，把「氓」利令智昏地形象，至死不悟，葬身魚腹的過程寫得活靈活現，確如林紓《韓柳文研究》所說此處「寫溺狀如畫」。
〈哀溺文〉以大量的感嘆詞「兮」深化騷文渲染情感，蘊藉遙深¹⁴。其〈招海賈文〉的文意與〈哀溺文〉相同，皆為諷刺貪婪無知的人性，其中描寫十分精細：

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超乎紛盪沃。殆而一跌兮，沸入湯谷，舐鱸
罪解稍若木。君不返兮魂焉薄？海若齎貨號風雷，巨鼈頷首丘山
頽，猖狂震號翻九垓。君不返兮糜以摧。

通過柳宗元豐富的想像，窮形盡相的描寫海上所遇到的種種艱險，他生動的刻畫種種動作、神態，飛揚的文采，充分地達到「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文心雕龍·詮賦》）的境界，可知柳宗元在精於觀察中，捕捉了事物不同的特質進行描繪，故能淋漓盡致的描繪出種種形象，他十騷筆下的人物生動，形象鮮明，情致畢現，帶有極其深刻的現實色彩與奇麗的想像。

二、命題之善，書寫憤鬱

宋晁補之謂：「〈離騷〉以虬龍鸞鳳托君子，以惡禽臭物指讒佞。王孫、尸蟲、蝮蛇、小人讒佞之類也。」說明了柳宗元承屈原善於託物諷刺的筆法。處於黑暗動盪的時代，柳宗元對於腐朽勢力的抨擊是極為強烈的，他在結構縝密、命題新穎的騷體創作中，予人一種巧妙、特殊的感受，極具匠心。章行嚴在《柳文探微》指出：「子厚諸騷，皆有所寓而作，絕非無病呻吟。¹⁵」或曰罵，或曰斬，或曰憎，或曰逐，或曰宥，他以這些蘊有強烈情緒的字眼為題，十騷的創作主體意識多能切中時弊，立論精當，深寓諷諭性。

例如〈宥蝮蛇文〉一文，「宥」字地命題下得極好，表面上是寬恕、赦免〈宥蝮蛇文〉文中蝮蛇之罪，實際上「宥」字中，帶有更多鄙夷、怨

¹⁴ 章行嚴在《柳文探微》〈哀溺文〉中指出：「子厚平生不作無病之呻吟，哀溺當亦非無所為而作，以意揣之，或是警八司馬中之程異。」（卷十八，騷，頁 578）。柳宗元在〈哀溺文〉中以「哀茲氓之蔽愚兮……始指幸者而為謀，夫人固靈於鳥魚兮，胡黷昧而蒙鉤」忠告程異應有所警惕，因子厚深深了解若不釋利，即易遭禍，故藉此文警示程異。

¹⁵ 見章行嚴《柳文探微》卷十八，頁 566。見阨於永貞之際的柳宗元，承屈騷筆法，以騷明其志。其騷文多有所寄託而作，書寫憤鬱，立論精確，筆調激憤。

憤的色彩，此是種反語。所以在該文中，柳宗元說「余」之所以不忍「殺」蝮蛇，而以「宥」之，乃因「妙不在問蝮蛇，先問蝮蛇得處¹⁶」，即反諷了姑息養奸的上位者。由太監與奸邪小人所擁護的憲宗皇帝，不正是八司馬事件的姑息養奸者？不也是促使柳宗元貶謫蠻荒，人生變調的元凶嗎？「宥」字澆熄了他心中的憤鬱壘塊，是他內心悲憤的直接投射，也是他昭雪堅貞節操的無言吶喊。

清儲欣《唐宋八大家類選》中曾對柳宗元的騷體文讚曰：

先生（柳宗元）騷文，命題便妙，曰罵、曰斬、曰宥、曰憎、曰逐，皆為賊賢害能之小人發也。然則宥愈乎？先生欲自持其身，無逢其害，故悲而宥之。讀是文，覺與其受宥，無寧受罵受逐受憎，猶為愈乎爾。

正說明了柳宗元承襲了屈原諷諭遙深的文風，將其深惡之情，轉為憐憫諷諭之筆，隱喻式地以簡潔的文字命題，書寫悲憤，以借物或借事議論說理，皆為那些殘賊小人，或姑息養奸地上位者而發。柳宗元的騷體文不僅命題之善，且能深化諷諭的主題，帶有極強的渲染力，也蘊涵了豐富的意涵。

三、諷諭遙深，篇篇警語

柳宗元十騷不是借物諷刺，就是借事說理，但他絕不只是藉著文章批判一些貪官污吏、權貴勢要，更重要的是提出發人深省的話，以警世人。例如〈憎王孫文〉一文通過「猿」和「王孫」兩種不同物種的描寫，說明應用君子而去小人。首先以及細膩傳神的筆法將「猿」刻化成一「德靜以恒，類仁讓孝慈」的仁慈謙遜形象，繼之以「德躁以囂，勃諍號呶，啁啾彊彊，雖群不相善」貪婪暴戾地「王孫」形象形成對比。透過兩者對比的落差，層層深入，最後得出「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的結論，貪暴禽獸的「王孫」，是可憎邪佞之人的具象化，柳宗元在文末發出：「群小逐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孽無餘。」警語，以示後人團結力量大，應用君子而去小人。

又如〈斬曲几文〉中以曲几喻當時以諂曲獲用者，在文中極寫曲邪之

¹⁶ 見林紓《韓柳文研究法》，頁98。儲同人此言正說明了柳宗元此文所撻伐「惡之至也」的對象，是昏昧識人不明的皇帝，亦是蝮蛇罪惡之源。柳宗元在該文中對蝮蛇是帶有強烈「惡極生憐」的情感，此「惡極生憐」之情最終轉而為激越憤鬱之筆調。

害，若柳宗元僅寫至此，那此文也不過就是他宣洩幽憤之作，但文末一句「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諂諛宜悌，正直宜宣。」此警語，不正是對上位者發出大膽而深刻的嘲諷嗎？極有振聵發矇之效，使此文更發人深省，十騷中歷歷可見柳宗元此一以貫之的脈絡。再者，如〈罵尸蟲文〉「以蟲喻人」，以人體內的「陰穢小蟲」，鞭撻奸邪小人的醜惡形象，文章一開始即藉道士之口大叱「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滿腹憤怒地柳宗元，遏不可止的激情噴灑而出。綜觀柳宗元十騷，篇篇情感飽滿，諷諭遙深，帶有極其深刻的個人理想，他「辭令褒貶，導揚諷諭」的文學主張貫穿其中，文章中所發出的警世之語，發人深省。

四、以散爲序，騷爲正文

柳宗元十騷中除了〈乞巧文〉、〈斬曲几文〉、〈招海賈文〉三篇無序外，其餘七篇皆有序文。其十騷地筆法大都事先以散文體的序文揭示寫作主旨與動機，然後才正式導入正文，寫來語言簡潔、犀利，情節層層遞進，其序文絕非如陳長方云：「余嘗疑宥蝮蛇、憎王孫文序已述其意，詞又述之¹⁷。」僅重複筆墨而已，其散文體的序文，往往使人對於該文所欲表現地思想與情感，有一完整的了解，在此基礎上深化正文的主題性，如此「序」與「正文」相得益彰，互爲渲染。例如〈愬螭文〉序文中道：

零陵城西有螭，室於江。法曹史唐登浴其涯，螭牽以入。一夕，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

柳宗元被貶柳州後，親身見識了柳州民眾迷信巫神習俗所帶來的累害，所以在〈愬螭文〉序文便由唐登滅頂起，寫其對鬼神之懷疑；正文寫唐登魂魄歸無所與螭怪的害人之相，並對鬼神之有無發出「神之有亡，於是推兮」的喟嘆！正文在序文地鋪陳中得以深化主題，藉以教化人民改變落後愚昧的觀念。又如〈逐畢方文〉一文，柳宗元先在序中以散文交代永州多火災，使得人民「咸無安處」，因此互相謠傳火災是由怪鳥畢方帶來的，而以騷體寫下了〈逐畢方文〉以示警儆，文中言：「胡今茲之怪戾兮，日十熱而窮災。胡肆其志？…知急去兮，愚乃止此。」如此說明柳宗元藉物

¹⁷ 見《柳宗元集》卷十八〈憎王孫文〉題注引，頁 498。

諷諭而非迷信怪力，同時也能深刻感受到他利民仁厚之心。

五、諷刺隱微，利民心切

劉熙載《藝概·賦概》說：「意之所取大抵有二：一以諷諫……一以言志。」，柳宗元十騷即是以「諷諫」與「言志」為書寫核心，繼承了古典文學中美刺的傳統。然而柳宗元作品中的諷刺不是直接表露，而是以隱微曲折的筆法書寫，使其怨騷之情滿溢，正意反說，借題發揮，達到絃外之音的隱微之妙。例如〈乞巧文〉便是以此手法達成婉曲隱微的諷刺。在〈乞巧文〉中，柳宗元以七月初七晚上看到女隸乞巧為由，隨即向天孫織女乞巧一事寫起。先是「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將自己形容為一無用、抱「拙」終身之人，實際則是以此反語，別有寄託，藉此曲折的肯定自己正直堅貞的操守，批評「變情循世」的世風。接著描寫「巧夫」地形象：

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唇一發，徑中心原。

膠如鉗夾，誓死無過。探心惡胆，踊躍拘牽。

表面上看似誇讚巧夫之「巧」，實際上卻是藉以揭露狡猾陰險、阿諛奉承之徒的面貌。如此諷刺變得尖銳而不顯露，且更有深味，在隱喻中也反諷了引領風騷的士人卻落得「士不遇」地的荒唐現實。如吳明光所言：「因為『反諷』反映了具體現實界的結構，而具體現實界事實上正是矛盾的會合處¹⁸」，此現實地荒唐與矛盾處，正是令柳宗元悲憤苦悶的原因。在王孫「胡不為之，而誑我為」的巧言溺語中，更凸顯了柳宗元他那「抱拙終身，以死誰惕」堅定情操的可貴。

行聖人之道，佐世利民，是柳宗元地政治理想。他在〈寄京兆許孟容書〉中說：「勤勤勉勉，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在〈時令論〉中說：「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而引天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正因為這般入世擔道，利民心切的堅持，使他內在的悲憤與衝突情感得以在關懷百姓的視野中消融。如其〈罵尸蟲文〉便是為

¹⁸ 吳明光在〈古代儒家思維模式試論〉一文指出：「因為『反諷』反映了具體現實界的結構，而具體現實界事實上正是矛盾的會合處」（《中國古代思維方式探索》，頁 69）。現實生活的體現亦即矛盾的糾結處，從柳宗元一生觀之，早歲秉持利安元元為務之志，卻落得遠謫蠻荒的下場，此人生矛盾的會合處，不正是柳宗元「士不遇」際遇的真實體驗嗎！

民請命之作。遠謫蠻荒的經歷使柳宗元得以親近百姓，親身體會人民疾苦，因此在〈罵尸蟲文〉中他大聲疾呼：「餘處既卑，不得質之於帝」，唯有尸蟲不生，明君再現，人民斯有樂土可言，在諷刺隱微的十騷中，那位關心民瘼，利民心切的永州司馬，不正鮮明的躍於紙上？

從柳宗元十騷作品大體可勾勒出他辭令褒貶與導揚諷諭的文學觀，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柳宗元在承繼屈騷的形式上又有變化，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他曲折隱微地筆法中，除了讚揚美好事物外，更能達到諷刺醜陋事物的作用，同時也凸顯了他為「道」而執「拙」的堅忍節操。就其蘊涵的思想內容而言，十騷除了在揭露社會與政治弊端的基礎上，表達了強烈諷諭外，更體現了他「仁義之心」、「仁民愛物」的儒家情懷。

伍、十騷導揚諷諭的文學觀及其餘續

柳宗元主張「文以明道」，他在〈楊評事文集後序〉云：「文之用，辭令褒揚，導揚諷諭而已。」此思想成為他騷體文創作的核心。意味深遠，含蓄犀利，具強烈諷刺意味又有獨創藝術手法地十篇騷體文，對後世影響甚大。從其騷體文的內容旨趣而言，精於描寫、諷刺隱微的騷體文，正是他「導揚諷諭」文學觀的體現。柳宗元始終堅持「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的理想，十騷表露了他對國家社會地理想與生命遭際苦悶的激揚情感。從文體而言，十騷更是對屈騷的繼承，在抒情的基礎上，夾雜說理、體悟、寫志、諷諭與議論，開創出一種獨特的文風。清·林紓有極為精采的見解，他說：「乃知」《騷經》之文，非文也，有是心血，始有是至言。賈誼、劉向作《惜誓》、《九歡》，皆有所感，故聲悲而韻亦長。東方、嚴忌諸人習而步之，彌不及矣……似者唯一柳柳州。柳州《解崇》、《恁咎》、《閔生》、《夢歸》、《囚山》諸賦，則直步《九章》，而《宥腹蛇》、《斬曲几》、《憎王孫》，則又與《卜居》、《漁父》同工異曲。惟屈原之忠憤，故發聲滿乎天地；惟柳州之自嘆失身，故追懷哀咎，不可自己，而各成為至文。即劉勰所謂真也，實也；不實不真，佳文又胡從出哉？¹⁹」可知柳宗元的作品字字心血，蘊含著強烈的悲憤與憤怒之情，他用世的真情及對百姓的關心，賦予作品更深層的寓意與價值。作為傳統知識份子，在中唐劇烈歷史變革的洪流中，柳宗元始終能保有儒者民胞物與的情懷，這

¹⁹ 見周殿富選編：《楚辭源流選集·楚辭論·騷經非文是心血至言》一文，頁 483。

是他堅卓人格境界的體現，透過「文以明道」之筆，開展出一種明知不可為而奮力為之的悲劇美感。

柳宗元的十騷以沈鬱、恣肆、幽深的獨創典型，對雜文賦風格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晚唐李商隱〈虱賦〉、〈結賦〉兩篇諷刺雜文體賦，可看到騷體流風之遺緒。如〈結賦〉：「夜風索索，緣隙任壁。弗聲弗鳴，前此毒螫。厥虎不翅，厥牛不齒。爾兮何功，既角而尾。」文章生動刻畫出那些躲在黑暗角落裡，伺機害人的陰險之徒，深富諷刺，從思想內容到寫法，都可看出是與柳宗元〈罵尸蟲文〉有著一脈相承的關係。皮日休、陸龜蒙的諷刺辭賦，鋒芒犀利，尖銳潑辣，也受到過柳宗元騷體文的啟發。孫樵〈乞巧對〉雖然僅得柳宗元騷文的皮毛，但可看到他對柳宗元〈乞巧文〉直接模仿的痕跡。宋代梅堯臣的辭賦富有現實性，多諷刺之作。劉克莊的詠物賦諷刺性也很強，如〈詰貓賦〉、〈遣蠹魚賦〉等作品，借物諷刺，筆墨淋漓，都可看出承續柳宗元的騷文筆法。元代辭賦大家楊維禎著有〈乞巧賦〉、〈罵虱賦〉，他的〈罵虱賦〉承襲了柳宗元〈罵尸蟲文〉的諷諭筆法，文中以「脅未暖席，有物噉身，若芒刺然。已而噉肉皆起癰疹，十指爬搔不得停，搔訖即成瘡痂」刻畫出危害之甚的「虱」地形象，因而滅虱有如「追蹤捕痕，若亡若存」之難，楊維禎進一步將柳宗元〈罵尸蟲文〉中無形的尸蟲予以具象化，對於「大毒大臭」罄竹難書的貪官污吏群極盡撻伐，這些都是柳文騷體導揚諷諭筆法的呈現。

柒、結語：三條交叉線的十騷

蘊含著濟世情懷的柳宗元始終是關注現實的，他是仁民愛物的政治家，也是深得風采的文學家。宋人嚴羽曾盛讚「唐人惟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滄浪詩話·詩辨》），嚴羽之言正說明了柳宗元在騷體文上的成就。柳宗元十騷的寫作，有其形成因素：有來自政治環境改變所激盪的創作動力，有其自我內在人生際遇的特殊體驗，更有傳統社會中知識份子憫時傷亂興發之議論，此三條交叉線，彼此間的互相作用，成為其作品書寫的脈絡，或悲憤、或哀鳴、或激切、或隱微，「十騷」成為柳宗元書寫情感的最佳載體。貶謫後的柳宗元，在承襲屈騷淒幽抒憤的脈絡上加以開創，融辭賦鋪采摛文，立意創新，獨樹一格，成為唐代騷體獨領風騷的大家，此番成就也許是原本亟欲入世擔道、在政治上力求改革的柳宗元所始料未及。在永州荒煙蔓草的孤寂中，柳宗元內心的苦悶與抑鬱

之情便也迅速蔓延開來，騷文的創作平台抒解了他厲揚的激情，滌宕了他悲憤的濃情。騷學的抒怨筆法消融了他身心的創傷，在此空間中，柳宗元得以重建他內心對「恆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的堅持。悲苦的人生際遇，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化事業。綜觀他的十篇騷體文，或舒泄幽鬱，或抨擊腐朽勢力，或反應現實，或諷世傷時，導揚諷諭，深具寓意。在篇篇體物精妙，富有現實色彩形的故事中，予人淋漓酣暢而又隱微曲折之感，我們也就能更深入的體察他簡練犀利的騷體文中所含蘊的獨特風韻。

參考書目

1. 柳宗元：《柳宗元集》。台北：華正書局，百家注本，1990 年。
2. 林紓：《韓柳文研究法》。台北：廣文出版社，1964 年。
3. 章行嚴：《柳文探微》。台北：華正書局，1983 年。
4. 段醒民：《柳宗元寓言文學探微》。台北：華正書局，1985 年。
5. 何淑貞：《柳宗元詩研究》。台北：福記文化圖書公司，1989 年。
6. 吳小林：《柳宗元散文藝術》。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
7. 王更生編著：《柳宗元散文研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
8. 王基倫：《韓柳古文新論》。台北：里仁書局，1996 年。
9. 吳福助：《楚辭註譯》。台北：里仁書局，2007 年。
10. 楊儒賓：《中國古代思維方式探索》。台北：正中書局，1996 年。
11. 馬積高：《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12. 鄭色幸：《柳宗元辭賦研究》，東海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1 年。
13. 周殿富選編：《楚辭源流選集·楚辭論--歷代楚辭論評選》。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 月第 1 版。
14. 簡宗梧：〈唐代賦體雜文研究〉，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唐代研究室專題計畫，2003 年。
15. 梁淑媛：〈柳宗元貶謫時期賦體雜文的悲憤主題及其自我治療意義〉，《應用語文學報》第六號。台北市：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文研究所，2004 年。
16. 蔡玲婉：〈柳宗元騷體文探析〉，《南師語教學報》第二期。台北市，國立臺南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2004 年。
17. 唐嗣德：〈憤世嫉邪 爲民請命--柳宗元《罵尸蟲文並序》的承先與啓後〉，《柳文研究》第八期。湖南：柳宗元研究學會，2007 年。